

中国教育科学德育研究丛书

中华美德教育论

刘惊铎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年·哈尔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美德教育论/刘惊铎著.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

(中国教育科学德育研究丛书)

ISBN 7—5316—3800—2

I. 中… II. 刘… III. 品德教育—研究—中国 IV. D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218 号

中国教育科学德育研究丛书

中华美德教育论

ZHONGHUAMEIDE JIAOYULUN

刘惊铎 著

丛书责任编辑:刘剑刚 王小明
丁一平 李 彤
贾海涛 梁 昌
孙延风 崔伟奇

技术编辑:王秀艳
封面设计:钟 嵘
责任校对:何 璐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4.625·字数 300 千

2002 年 3 月第 1 版·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16—3800—2/G·2896 定价:23.50 元

目 录

传统美德教育的现代视野(代序).....	(1)
第一章 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生长点.....	(1)
第一节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及其理论转换	(1)
第二节 中华美德教育的价值取向	(14)
第三节 中华美德教育的规范体系	(19)
第四节 中华美德的修养境界	(43)
第二章 中华美德教育的内容侧重点	(67)
第一节 创新道德教育	(67)
第二节 生态道德教育	(70)
第三节 交往道德教育	(74)
第四节 网络道德教育	(86)
第五节 性道德教育	(90)
第三章 中华美德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模式.....	(104)
第一节 中华美德教育模式的构建.....	(104)
第二节 道德体验模式.....	(119)
第三节 协作互励模式.....	(141)
第四章 中华美德教育的方法创新.....	(151)

第一节	中华美德教育方法之方法论创新·····	(151)
第二节	中华美德教育方法的创新·····	(184)
第五章	中华美德教育的实践着力点探索·····	(190)
第一节	中华美德教育实践着力点的理论定位 ·····	(190)
第二节	中华美德教育的实践着力点·····	(212)
第六章	中华美德教育在小学的实践探索·····	(227)
第一节	小学德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227)
第二节	21世纪在小学实施中华美德教育的现实基础 ·····	(235)
第三节	中华美德教育在小学的实践探索·····	(244)
第七章	中华美德教育在大学的实践探索·····	(262)
第一节	中华美德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262)
第二节	民办大学中华美德教育的实践探索·····	(278)
第三节	公办大学中华美德教育的实践探索·····	(285)
第八章	中华美德教育在特殊学校的实践探索·····	(289)
第一节	特殊学校德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89)
第二节	特殊学校实施中华美德教育的内容侧重点 及评估标准·····	(292)
第三节	对特殊儿童中华美德培养模式的研究 ·····	(308)
第九章	高等财经人才中华职业美德培养探索·····	(330)
第一节	21世纪对高等财经人才职业道德的新要求 ·····	(330)
第二节	21世纪高等财经人才职业道德培养的目标 与内容·····	(345)

第三节	21 世纪高等财经人才职业道德培养模式 探索	(357)
第十章	中华乐育研究	(377)
第一节	中华乐育资源开发的理论探索	(377)
第二节	中华乐育资源开发的实践探索	(398)
第十一章	21 世纪人才培训方案与测试指标体系 ...	(412)
第一节	21 世纪人才培训方案与测试指标体系使用 说明	(412)
第二节	21 世纪人才素质培训与测试的内容和项目	(416)
附录	(446)
后记	(447)
参考文献	(450)

传统美德教育的现代视野

(代序)

朱小蔓

几千年文明史中,传统美德无论对哪个国家都是很有价值的,每一次文明的发展都是与传统文化碰撞的结果。雅斯贝尔斯曾说过,“西方每一次伟大时代的出现都是重新接触和研究古代文化的结果。当古代文化被遗忘时,整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野蛮,就如一件东西脱离了根本,它就会毫无方向地飘荡,这也就是我们失去古代文化之后的景象。”然而近百年来,东西方都有忽视传统美德教育的历史。

上世纪中国和美国都开始全面反思,发现传统美德不能抛弃,反思后的回归强调古今东西传统美德的融合,重视返本开新。虽然传统美德的许多德目还有开新的价值,但也必须面对各种新的挑战,在继承中创新和发展。

现代西方称传统美德教育为“美德袋”式教育,即把学生看成一个道德容器,将传统道德的德目灌输进去。西方道德教育哲学有两大基本流派:一是德性伦理学,另一是律则伦理学。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德性伦理学认为道德与人的情感、习惯有关,美德靠习惯、情感陶冶而成,道德教育以培养德

性为宗旨。而以康德为代表的律则伦理学主张人的道德形成靠理性对道德律令的服从。但无论哪一派,千百年来一直以重视德目和单向灌输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形式。

在 20 世纪初,这种德目论的传统道德教育首先在美国遇到了挑战。此后产生的“新教育”、“进步教育”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强调服从、灌输的传统道德教育观念和形式。杜威认为不存在绝对的道德真理,道德教育是使人在道德上发生转变的过程,而不只是给人关于道德的知识,学校道德教育不能与生活相脱节,要使儿童在参与实际生活的经验中,在与他人的合作交往中发展其道德判断力,因此要尊重儿童的兴趣、能力和经验。以皮亚杰、柯尔伯格为代表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儿童是道德的自主建构者,任何外来影响都只有通过儿童认知结构的过滤才能发挥作用。这场新教育运动使得主知主义成为道德教育的主潮,可实践证明,主知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道德教育的难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了科学主义、主知主义思潮,不约而同地开始反思分割性、孤立性、唯认知性的道德教育。麦金太尔在其《德性之后》一书中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德性概念和近现代以来道德教育的成效,特别是当时对德性的诋毁所造成的道德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道德教育要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亚里士多德时代”,回归德性论时代的主张,由此出现了一种向传统美德教育、品格教育回归的趋势。这次重新强调道德教育注重向传统美德、基础性道德的回归,是对传统美德袋式的道德教育以及后来的主知主义道德教育的扬弃。

中国古代有着优秀的文化和道德。但近代,在西洋武器和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思想家们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时

候,采取了一种较为激烈的批判态度。严复、梁启超等人发起和推动的启蒙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有所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开端,更是鲜明地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开始了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批判态度。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主要是“美德袋”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借鉴西方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又出现了新问题。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现代社会,人们被快餐式的相对价值标准搞得头晕眼花,无所适从,于是传统美德教育的价值又凸显出来。人们发现,道德判断、选择能力的培养,必须以一定的基本道德观念为基础,同时个体也有遵循这些基本美德的需要。例如南京举办的焦波的《俺爹俺娘》影展,之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就是因为那些普通农民的生活黑白照片唤起了人们心中对孝敬这一传统美德的怀念。可见道德教育不只是培养人的道德认知能力,还必须培养人的情感并使认知与情感协调,达到知情意的统一,学做合一,让个体在理智和情感上都有认同感、服膺感,在当下的生命体验中逐步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

但是,当代多元文化的碰撞、频繁的人际往来和信息交流,往往突破了传统文化道德体系的价值疆界,不同生活和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在相互尊重与协作中生成着新的中华美德。长期以来美德袋式的传统道德教育之所以受到批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其实道德存在于关系中,是人在面临一个境遇、一个真实关系时的行为选择。因此各国都强调道德教育要教会学生自主选择,使他们真正成

为道德的主体。现代青少年儿童在道德发展上既有令人担忧的一面,也有开新的一面。他们生长在一个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极大发展的时代,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增强,乐于接受新事物,在价值观上已经不受过去传统的、封闭的一元价值观的简单约束,还时常以自己的行为实现一种新的价值追求。他们有一些新的道德观念,其中可能就包含着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萌芽。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米德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基本形式,特别强调“后喻文化”即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孙云晓提出“信息化社会决定了两代人的双向社会化,成人‘化’孩子,孩子也‘化’成人”。“向孩子学习,两代人共同成长”成为今天一个有价值的道德教育命题。

对传统美德如何返本开新,是近现代以来东西方社会普遍探寻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既要看到现代人生存方式的转型,现实生活中传统美德的缺失,更加凸现了传统美德教育的当代价值,又要看到现代道德教育以传统美德教育为根基来建构,并不是简单地向“美德袋”式的道德教育回归,而是对传统美德教育的一种扬弃。新的中华美德教育要弘扬传统美德教育中具有时代感和生命力的内容与方法,淘汰其陈旧的德目和单向灌输的封闭教育方式,不断向新生活开放,向未来开放,向世界开放,向个体生命开放,在开放中返本开新。

《中华美德教育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在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返本开新上做出的积极而大胆的尝试。

书中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注重解决实验学校道德教育的实际问题,研究过程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参

与,取材大量来自第一手观察和实验的素材,不少新鲜而有新意的理论观点亦有实践探索的支撑。

其研究的视点聚焦在中华美德的理论生长点、中华美德教育的实践着力点及其培养模式与方法上,既重视中华美德教育理论上的创新,也注重中华美德教育实践上的开拓性探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总之,以道德教育哲学的范式梳理、反思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试图生成和建构新的中华美德及中华美德教育体系,是一个崭新而有难度的道德教育研究课题。惊铎等一批醉心于道德教育研究的探索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投入了不少的精力,做了不少有创意的试验。我相信,这样的研究会给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思考中国的道德教育改革与发展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至于书中所提出的中华美德规范体系为“团结协作、创新、生态”,中华美德修养境界为“灵人、真人、善人、凡人”,“俗人、假人、歹人”为几种实存德性状态,中华美德教育的基本模式为“道德体验模式”、“协作互励模式”等学术观点,确很新颖,富有想像力,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也许书中所提到的一些带有根基性的问题的澄清,会诱发出我国道德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某种新契机。

2001年仲春于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第一章

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生长点

第一节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及其理论转换

一、研究的切入点

多年来,围绕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这一课题,反复碰到好意的提醒,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研究价值了,甚至连在实践中存在的必要性都遭到了怀疑。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有的人对千百年来曾经团结、鼓舞无数中华儿女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中华传统美德”会产生疏远感、隔膜感甚至是反感的情绪呢(当你对有些年轻人说他的身上具有中华传统美德时,他首先感到惊讶,然后感到你在嘲笑他、羞辱他)?中华传统美德与当代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过时了吗?

在国家“八五”期间,吴元训教授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重点项目《我国民族优良道德教育传统与我国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研究》，对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大量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反思；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民族优良道德教育传统的理论范畴、历史演变和在当前我国学校道德教育中的继承与发展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比较和调查研究。该项目探明了这样几个主要问题：1. 中华传统美德的理论范畴及其历史演变；2.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理论范畴与实践定位；3. 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与当代青少年儿童的道德发展状况之间之继承与发展关系现状的调查分析等。

在这同时，国内外学术界对传统美德的态度的转变，又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学术氛围。

自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当代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不断出现所谓“经济发展，道德退步”的问题以来，世界各国学术界都空前关注“传统美德”的研究和实践问题。其中较有影响的，首先要数美国道德教育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麦金太尔在其代表作《德性之后》(After Virtue)一书中深刻指出：在西方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一个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德性传统。整个西方世界，自亚里士多德之后，一直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所划定的范围里发展的，因而整个社会有一种良好的秩序。中世纪的伦理学仍然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为教本的体系。但是，自从中世纪进入一个与亚里士多德对话的历史时期之后，这一德性传统中便开始既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特色，又有基督教神学的特色。越到后来越是走样，以致只留下了一些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残片。特别是在现代化

过程之中,经过休谟、狄德罗、边沁、康德和克尔凯郭尔等许多理论家的反复论争,我们现在继承了从不同的背景条件下产生的互不相容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这些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作为过去的残存物存活于我们的生活中,这些残存物由于脱离了原本发挥它们作用的历史背景条件,因而已面目全非。而它们都加入到当代的道德论争中来,因而承继了这些残存物的当代道德生活,就是一个有着许多不相容的道德观点和道德观念的道德大杂烩。现代社会缺乏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的践行,必然败坏这一传统,也败坏实践。当代严重的道德危机的症候,是严重的道德上的多元无序状况。当代西方的道德衰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历史的变迁而拒斥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因此,要清楚地认识当代道德危机的性质,就必须追述这个传统。^①

在亚洲,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特别注重研究和保持自己已有的文化传统,其中尤其是德性的传统。

实际上,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更悠久、更博大精深、更辉煌灿烂的德性传统。这一传统自以周公、孔子和孟子等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始,历演几千年的建设性发展路程,逐步修正、逐步扬弃、逐步完善着。在这一德性传统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乏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始终既与这一传统的源头思想进行对话,又不断开出新生面,既迎接了新的挑战,又充新和拓宽了这一传

① [美]A·麦金太尔著:《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统的内涵。因而既葆有了传统,又活化了传统。可以说,中华传统美德是一个开放性的整合系统。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挖掘、继承和发展,不能不是我们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①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认识和研究它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方向和动力价值。我国内地和香港、台湾等地,有不少学者一直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作用。他们在“新儒家”的线路上坚持研究,其研究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只是这一个线路的研究渗漏出一种“复古”的倾向,而与当代青少年儿童的文化背景、生活条件和发展取向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一相情愿”之嫌。亚洲一些国家对待中华传统美德的态度和做法,尽管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它们在国家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和企业管理中取得的显著成效,却是不可抹杀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应当看到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它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所实施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却不能否认其道德教育的力量。美国刘易斯堡巴克内尔大学的历史学家玛丽·伊芙琳·塔克尔教授分析说:“孔子精神足以勉励亚洲四小龙地区的人民渡过难关,奋发图强……我们要振奋民族精神,就应学习孔子哲学和道德精神。”美国俄亥俄州春田市威顿伯格大学政治学教授尤在提醒和警告美国人的时候,更是尖锐地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在“基督精神”的

^① 朱小蔓:《传统美德教育的现代视野与具体研究方法》,《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支配下发展的,它给西方国家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人们却忽视了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东方伦理道德文化”的价值,这就带来了许多麻烦。“孔子思想可以作为新世界秩序的原动力。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足以证明孔子精神更胜基督精神。勤奋上进,自强不息,崇尚道德,放之四海而皆准。新加坡及其他东亚国家备受其泽,因此而兴旺发达。虽然 19 世纪后,亚洲受到西方精神的洗礼,但孔子精神没有被埋没。我们要重振人类道德,就必须学习孔子的道德精神。否则,我们不可能再领导全球。”为此,必须认真地研究和对待“东方传统美德”,必须把“西方的基督精神”和“东方的传统美德”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①

更为值得深思的是,一直致力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研究的 A·麦金太尔,在 1989 年为《德性之后》中文本写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我也希望,对我的观点和论证的批评将有助于阐明你们的答案。在相互批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彼此向对方学习系统地提出较好的问题和给予更适当的回答:只有通过相互批评,建设性的道德论争才能够出现。在这种论争中,至关重要的是在西方应该能够听到中国人的声音,学到中国人的东西,正像在中国应该能够听到西方人的声音,学到西方人的东西一样。”^②

以上的观点和思想,为当代的道德教育研究开拓了一种

① 《编译参考》(中国外文出版局),1992 年第 10 期,14~15 页。

② [美]A·麦金太尔著:《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 页。

新的思路,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发人深思,是我们研究中华美德教育的重要的国际国内学术背景。

二、对五四以来反传统主义倾向的反思

五四运动以后,现代中国文化中潜在着反传统主义的倾向,并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化思潮,而且通过主客体的反复整合,已经凝结为一种民族人文品质。这种文化,有人称之为“后五四”文化。在“后五四”文化的笼罩下,有意无意地导引着中国的道德朝着两个向度延伸:一个向度是“怨古尤祖”,即当代的青少年不管懂不懂传统,有没有足够(姑不论深厚)的传统积淀,都可以对传统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他们喜欢把现实中的种种缺陷和不足都归之于传统,进而俨然以道德裁判员的姿态出现,试图将传统荡涤一清,方为快意。有人曾深刻指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彻底批判,并且反复涤荡。五四运动以后的反传统已成为一种具有惯性的连续性社会和学术活动,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两次:“文革”中,反传统形成一种政治运动;20世纪80年代则进一步演变成为一种文化思潮。

另一个向度是养成人们逃避现实责任的道德品质,导致现代化建设者主体性的丧失。反传统主义文化的一个惯用逻辑是:现实中的一切不合理都是传统造成的,传统文化应当对现实负责。这样一来,现实社会的建设者们所造成的一切失误和不合理的行为,便都在一片反传统的呼声中被淡化以至逃避任何现实责任,甚至用一句“传统使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道德的盾牌。但是,从古今中外文化发展史来看,真正能够承担得起反传统任务的人,不是那些对传统带有天然

反感情绪而不愿意了解和亲近传统的人，恰恰是那些具有深厚的传统积淀并具有很强的包容心的人。而现在有一些人并不具有反传统的文化底蕴却好以反传统主义者自居，常常是把反传统作为一张为自己开脱现实道德责任的道德盾牌，从而将传统领域搅得鱼龙混杂，真伪难辨。

如果放在道德哲学的天平上来衡量，现代人对待传统的态度过度激烈，其深层原因可能是对传统缺乏一种深入细致的了解，而又有有意无意地想加给传统一些它根本就承受不起的现代责任。而这种做法本身恰恰是违反道德精神的，是不公正的，是不道德的。希尔斯曾深刻指出，任何社会的传统都是人们选择的结果，人们虽然不能逃出传统的掌心，但传统及其力量毕竟是有限的。现代西方解释学理论也指出，传统是人们对历史文本进行“意义理解”的产物。如果说传统对某个时代发生了作用，那么，必定也是通过这个时代的现实的人而起作用的；如果要归咎责任，主要的也不应是传统的责任，而应该是当代人的责任。^①

从中国对待传统的历史来看，也有过理性的继承和发展；但从人口比例和现实情况看，常常是非理性的力量占了上风。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以公正为核心，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进行清理；把中华传统道德放在“古今东西”的维度上，结合现实生活和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改造、优化和创新。不能误以为既然是中华传统美德，便不能动它，以至于中国社会和当今的世界已经大踏步向前发展了，我们还要抱残守缺，坚持用中华传统道德来评价和框定充满新意而又丰

^① 参考高兆明先生的有关研究。